

编者的话：《军事历史》从本期开始，设立“军史三人谈”栏目。以前沿探讨、开放包容为宗旨，诚邀各方专家，围绕设定主题，研讨学术问题，畅谈研究心得，展开观点碰撞，激发思想火花，发“一家之言”，抒个人之见，以达活跃学术气氛，推动研究发展之目的。

Mao Zedong's Military Heritage

## 毛泽东的军事遗产

□ 曲爱国 张世平 黄迎旭



曲爱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曲爱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毛泽东的军事遗产。毛泽东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者，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指挥者，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创造者，也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这些头衔当然不是为制造个人崇拜而杜撰出来的，而是每个头衔都有实实在在的历史内容。毛泽东所创造的战争伟业和军事思想震烁古今中外，在世界军事史和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100个人对毛泽东的领悟与解释会有100种，评价也是各有千秋，但包括那些贬低他、攻击他、批评他的人，也包括他的对手和敌人，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统帅、伟大的军事家。他所留下的战略战术、军事思维和军队建设理论等等，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实的，对急速进行中的战争样式转变产生着影响。美国军事理论界比较活跃的陆战队上校托马斯·哈梅斯在其著作《投石器 and 石块》中称：“网络化战争，人称第四代战争，起源于毛泽东领导的、复杂而长期的人民战争。”所以，像《孙子兵法》具有永恒影响一样，毛泽东所留下的军事遗产，是一笔宝贵的军事财富，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影响是深远的。

毛泽东导演了中国革命战争，领导了人民军队建设，而且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他给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军队留下了太多的东西，已经将自己与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人民军队的发展和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融为一体。虽然他已经离去近40年了，但他留下的东西今天依旧在影响着、规范着和指导着我们。如果搞不清毛泽东到底留给了我们的民族、国家、军队什么，到底这些东西的价值怎样，到底这些东西是如何影响着中国、影响着世界，那么要领悟中国革命战争史，领悟人民军队发展史，领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领悟已经走过80多年历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悟我们当今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选择了“军事遗产”这样一个视角来领悟毛泽东，探讨军事史，研究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系。



张世平：军事科学院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世平】关于毛泽东的军事遗产，在见仁见智的总结中，我认为主要指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军事思想。包括：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思想、战略思想、作战（战役战斗和指挥）思想、国防建设思想、军事辩证法（或称军事哲学思想）等。毛泽东的军事遗产，在信息化时代、世界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的军事遗产来源于丰富的军事实践。其中包括以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国内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以反抗外侮、维护民族生存的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以支援邻国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周边安全的跨境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为目的的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印边境、中苏边境）；同时，还包括以平息内乱、维护新生政权为目标和以反击国民党势力反攻大陆、促进祖国统一为目标的国内军事斗争；以支援邻国反侵略、维护周边秩序为目标和以打破强国封控围堵为目标的国际军事斗争；以及建立强大人民军队、增强军事实力的国防建设实践。丰富的军事实践，决定了毛泽东军事遗产具有无与伦比的内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毛泽东是古今中外唯一指挥过4场战争和70多场战役的统帅，是唯一既有大量战争实践、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又有大量军事理论著述的军事家。为此，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评价说：“主席先生的著作感动了一个国家，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在201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全军研讨会上，我讲过这样一句话：“当人们把毛泽东从神坛请下来的时候，我更加觉得毛泽东的伟大。”这是经过对军事理论潜心研究之后，对伟人产生的新一轮崇敬和心得。

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断探索的一生。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探索以胜利告终，奠定了毛泽东军事遗产的基础。维护周边安全、保卫新中国的探索也以胜利告终。在属于他的时代，在属于他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丢失一寸领土，没有丧失一毫主权。他的探索，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遗产。“历史从来不责怪探索者”，何况毛泽东在军事探索中始终是胜利者。

### 毛泽东的军事遗产：战略战术思想

【张世平】研究过毛泽东的人都会被他身上浓重的“大气”所感染，这是战略家的气魄。我在《大道探源——毛泽东与战略》一书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大手笔”是毛泽东军事实践的一大特点，也是他能够凝聚人心、战胜敌人重要的精神基础。在红军极其弱小的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他指挥红军连续取得了多次反“围剿”战役等较大规模作战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党所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开赴敌人大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全国解放战争敌我对比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他即指挥人民解放军转入大反攻，进而发起大决战，并以大迂回、大包围、大进军一鼓作气解放了全中国。新中国刚刚成立，在百业待兴、百废待举之时，他下决心出兵朝鲜，指挥志愿军在朝鲜半岛打了一个大胜仗——毛泽东的“大”，是建立在主观与客观紧密结合基础之上的，是深谙战争规律、制胜之道、国家安全之策的展示，当然也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艺高气盛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在战略方面的建树颇为丰厚，许多实践范例、许多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主持召开古田会议，确定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基本原则；在战略退却中提出调整战略方向、转战敌人薄弱处的思想；选择西北

建立革命大本营,作出“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战略决策;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全面持久抗战路线,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创建山东和东北根据地的战略预置思想;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做出不搞“南北朝”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维护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两大基点”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领导指挥打赢抗美援朝战争,确定“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确立“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总政策;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在毛泽东军事遗产中,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可谓一束奇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特别强调防御和进攻的交替应用;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诱敌深入是最有把握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战略反攻是防御战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慎重初战;以及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等。在和平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依据国家安全形势正确确定主要战略方向和战略对手,战争爆发前大力加强军事建设、努力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营造有利态势遏制和推迟战争爆发;战争一旦爆发,即实施有力还击、迫使敌人进行持久作战、逐步剥夺敌人战略主动,其中还包括该顶的地方顶、该放的地方放,重点设防和重点守备,等等。1955年,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历来是积极防御,作战行动是后发制人,决不首先发起战端。”1956年,中共中央确定以“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作为国家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实质,就是在被动与守势的情况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理,把防御和进攻、总体与局部辩证地统一起来,寓攻于防,攻防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利用战争的正义性和时空条件,以积极有效的行动改变力量对比、创造有利态势、夺取最终胜利。正如陈毅所说:进攻与防御这两个战争的基本方式,在一般军事家那里,进攻就是进攻,防御就是防御,但“落在毛主席手上,便发现新的内容与新的角度”。

毛泽东在作战方面的建树特别丰富,“十六字诀”、“十大军事原则”等,都是著名的作战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与龙王比宝”、“零敲牛皮糖”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军事名句。就战役战斗而言,有12个方面是长期影响我军的重要思想:实行战略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密切配合;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发挥近战、夜战特长;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力求有准备;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两种手段并用。

就作战指挥而言,有10个方面是长期影响人民军队的重要思想:努力提高主观指导能力,能动地指挥作战;全面掌握敌我双方及各方面情况,努力做到知彼知己;每战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着眼,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慎重选择作战目标、地区(方向)和时机,立于完全的主动;对作战力量的使用必须以集中为主,集中、分散和转移兵力灵活运用;对作战方法的运用必须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基本战法,依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有效的手段;抓住作战的中心问题,统筹全局,把握关节;集中统一指挥,灵活机动行事;把握作战节奏,保持作战锐势;主动、灵活、坚定、隐蔽地实施指挥,充分发挥司令机关的作用。

毛泽东战略和作战思想有四大特点。第一,从来都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战争问题。战争是政治

的继续，毛泽东不仅承接了这一思想，而且把这一思想运用于战争实践、和平时国防建设实践、国际斗争实践。第二，从来都不惧怕强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毛泽东非常著名的论断。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战争硝烟中走来，面对国内外强敌，毛泽东从不气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战斗姿态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体现了对强敌毫不畏惧的“精气神”！纵观人类历史，政治家与政客、领袖与领导者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有没有这种“精气神”。第三，从来都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摆在第一位。毛泽东有几句口头禅：“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人定胜天”、“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在毛泽东的军事经典中，敢打必胜的战争意志和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等，常常被一个“气”字所概括，对精神因素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奠定了毛泽东所领导指挥的战争，总能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情况下，战胜敌人、赢得胜利。第四，从来都不打死仗、死打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人们对毛泽东战略和作战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纵观毛泽东领导和指挥的战争的历史，一个“活”字贯穿始终。他精通中外历史，熟知古今兵书，从来不乏“师意”却从不“泥迹”，着眼达成“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灵活用兵、灵活用法，随机应变，始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成为毛泽东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全部秘诀！

纵观人类历史，哲学家不一定是军事家、战略家，但真正的军事家、战略家必定是一个哲学家。从上述特点可见，毛泽东战略和作战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

【曲爱国】毛泽东的战争指导从来都是不拘一格，毫无成规，追求“活打”，反对“死打”，总是一切从战争、战场、敌我、攻防的实际出发，来确定战争指导的方略。在战争的舞台上，他是最讲兵法的人，也是最不受兵法束缚的人。他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指导战争，不但指挥自己的军队依照自己的节奏进退，而且迫使敌人按照自己的步伐行动，即使兵临绝境，即便战局危殆，他依旧从容不迫地调度战争的进程，甚至将对手玩弄于股掌，夺取最后的胜利。那份自信、那份潇洒，令多少人赞叹。他对战争指导有一个经典解释：打仗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无非就是这四句话。这四句话，揭示了战争指导中的各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几乎可以诠释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所有的战役战斗，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今天，我们在规划战争、指导战争时，依旧需要这种使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事物至简至清的指导原则。

### 毛泽东的军事遗产：军事思维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黄迎旭】研究毛泽东军事思维，就是从哲学层面来研究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这是毛泽东军事遗产的重要内容。我认为，伟大的军事家必然会给后人留下哲学层面的东西。

我一直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我始终认为思想必从史出，这是我长期从事军事思想研究得出的经验。研究军事思想一定要有深厚的军事历史功底，要懂得军事史；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就特别要对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对毛泽东指导战争的历史有深透的理解、深透的研究。结合对军事历史的研究，我认为，毛泽东军事思维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全力抓战略问题；二是掌握主动权；三是讲求辩证思维；四是注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毛泽东的军事思维体现在他的著述中，更在他的战争实践中表现得淋

漓尽致。

**全力抓战略问题。**1965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余秋里汇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时说：“搞军事工作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四大教程我根本不管，我也不懂。我只研究战略、战役。”毛泽东指导战争，抓战备、抓军队建设，他的注意力首先是在战略问题上。毛泽东对战略的解释是四个字：“高屋建瓴”。就是说，战略是制高点，抓住了战略问题，正确地解决了战略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毛泽东称之为“势如破竹”。毛泽东解决战略问题，从三个方面下工夫：（一）找规律。规律就是事物的本质联系，它决定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趋势。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中日双方的特点及本质联系研究得十分透彻，从中得出抗日战争必然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战争的基本形态是犬牙交错的判断，如此也就有了持久作战的战略筹划。那么，如何找规律？毛泽东强调要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大贡献，也是大智慧。有了这个大智慧，中国革命之路才得以走开。此前，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天条，是改不得的。俄国革命是中心城市暴动，中国也必须走这个路。但是毛泽东着眼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特点，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大战略。而这个大战略，就基于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准确把握。（二）把握趋势。要把握趋势就要有预见。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用一大段话来讲预见问题。他说：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讲，最重要的是预见。什么是预见？当日行中天的时候大家都能看见，这不叫预见；只有在事物刚刚冒头的时候，你看到了，而且看出这是未来趋势，这才是预见。预见是需要功力的。这种功力在于把握事物的本质，把握发展规律。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1942年7月毛泽东给刘少奇发了一份电报，提出“预置山东”的问题。毛泽东预见日本偷袭珍珠港，捅了马蜂窝，把美国卷入战争，日本必败无疑，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应付抗战胜利后的局面。抗战胜利后局面的基本问题，就是国共矛盾和冲突。因此共产党必须壮大实力，北方的根据地应连成一片并扩大之。日本失败后，东北权力真空，谁先进去就是谁的。要占东北，必须经略山东，建立战略枢纽。这就是毛泽东的建立在事物发展趋势正确判断基础上的战略预见。（三）掌握枢纽。毛泽东是善于抓枢纽的人。辽沈战役抓住打锦州这个关键，锦州一打，辽沈战役的结局就决定了。为什么要抓这个枢纽，因为这个枢纽不仅决定东北战场全局，而且还决定着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一旦国民党的东北军队退入山海关，华北的事就不好办了。确定这个枢纽就在于毛泽东能对全局乃至战争发展的趋势，以及战场各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把握。掌握枢纽还体现在把握转折的关节点。该转的时候一定要转。

**掌握主动权问题。**毛泽东指导战争，对主动被动问题是高度敏感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句话：主动被动就是军队自由和不自由的状态，而自由行动权是军队的命脉。军队没有自由权了，那么离被消灭就不远了。始终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这是毛泽东指导战争的一个基本着力点。毛泽东争取主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主要从大处着眼：（一）正确解决力量基础问题。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力量在哪里。抗战的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根本分歧在于，毛泽东坚定地把抗战力量建立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基础上，蒋介石却不相信中国人能打败日本人，他总想借助英美的力量来对付日本。毛泽东和王明的分歧也在这里，王明不相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民众力量，而认为抗战主要靠国民党，毛泽东则相反，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要紧紧地依靠全中国人民，就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发挥领导作用。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毛泽东一生，都把人民的支持看作党的力量之根本所在，只要有人民的支持，再强大的敌人也可以战而胜之。（二）党的领导要大体

正确。党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会见外宾时讲，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你要打仗，你要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解决根据地问题、解决统一战线问题这样一系列政治问题，才能够去打仗。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就是自主作战，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作战思想已经渗入人民军队的骨髓里了。（三）要及时“转弯”。毛泽东在七大上专门讲这个问题。毛泽东把懂不懂得转弯上升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知道及时转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也就在于及时转弯。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八路军三个师派到山西前线配合抗战，并指示要在五台山一带集中使用，但北平失守后，华北的抗战局面一溃千里，蒋介石的部队跑得太快，毛泽东立即改变部署，要求三个师分开摆。这样的调整，对八路军来说，生死攸关，并对掌握华北主动权意义重大。

讲求辩证思维。讲到毛泽东的军事思维，不能不提到“军事辩证法”。“军事辩证法”这个概念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刘亚楼曾留下一个聆听毛泽东授课时记录的讲课提纲，标题是《军事辩证法》。军事科学院曾庆洋部长考证过，这是毛泽东所著《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提纲。后来毛泽东在正式发表时，没有用“军事辩证法”这个概念，代之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考虑易于为我军指战员所理解、所接受，主要讲清楚中国革命战争应该怎么打就行了，但实际上，其中所讲的战略问题都带有军事哲学性质。要理解毛泽东的军事思维，要掌握毛泽东军事思维的高妙之处，必须研究和掌握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毛泽东的军事哲学，可以称之为军事辩证法。

有同志提出，20年前，军事辩证法曾是一门“显学”，为何今天如此悄无声息。这其中原因很复杂。我认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套用于军事辩证法，而不是从战争实践中概括出它所特有的范畴，构建起它所特有的体系，由此让人错误地以为军事辩证法无非就是将现成的哲学范畴和原理放到军事理论当中，了无新意。军事科学院成立军事辩证法研究室时，宋时轮院长专门有个讲话，讲应该怎么研究军事辩证法，他强调要从军事实践本身提炼出概念和范畴来，不要急于搭建体系。实践证明，宋院长的意见是很正确的，也很有预见。哲学是有流派的，我们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基本看法，包括唯物论和辩证法。毛泽东有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我觉得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最合适的概念就是“军事辩证法”。

注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并取得成功的。所以，毛泽东一直特别强调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理解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思想，需要深入理解他在讲战略战术时所用的“游泳术”这个概念。他说：“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要不使自己沉没，就要使自己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游泳需把人的动作和水的浮力相结合，在毛泽东看来，就是把客观和主观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首先要遵循唯物辩证的认识路线，做到实事求是；还要善于正确地估量敌我力量对比，做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还要善于把灵活性和计划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还要善于把科学态度和敢打必胜的勇气结合起来。总之，毛泽东的军事思维博大精深，又通俗易懂，很有特点。

### 毛泽东的军事遗产：军队政治工作

【曲爱国】毛泽东之用兵如神，不仅在于他窥破天际，具有超人的军事思维，战争指导高人一筹，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他统帅着一支与其他军队迥然不同的人民军队。他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治军准则，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军队建设制度，这些思想、理论和制度至今依旧影响和规范着人

民军队建设。毛泽东在军队建设方面留下的遗产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政治建军，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建立起坚强有力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1954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做了两处重大修改，一是把原稿中“积极地有步骤地建设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这句话中，“世界上第二支最”这七个字删掉了。二是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量的保证”这句话，恢复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其中“的生命线”这四个字，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如果说第一处改动体现了毛泽东在建军目标上的一种态度的话，那么第二处改动，则体现出毛泽东在建军问题上的立场和准则。它实际上所涉及的是建军的重大原则问题。

当时，军队建设正处于由战争向平时时期转变，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全面起步时期。在军队建设方面，提出要“学习苏军”，学习苏军的模式来规划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一个问题当时争论比较大，就是要不要学习苏联军队实行单一首长制，这场争论逐步演变为更高层面的认识之争，就是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怎样才能有效保持和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对这个问题考虑得很深，他面见毛泽东，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军队中的党委制必须保留，政治委员制度必须保留，不能学习苏联军队搞一长制。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传统不能丢。毛泽东的表态也非常明确：军队还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政双首长制不能变。

被称作“生命线”的政治工作，既非攻守之道，也非谋略之策，而是一整套人民军队独有的建军治军方略，是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只有理解了这一过程，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理论和所建制度的内涵。

毛泽东曾依据近代中国军队的发展历程，将其划为三代：第一代是清末新军，这支新军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完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任务，却沦为军阀割据、鱼肉民众的武装。第二代是国民党建立的国民革命军。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的支援下，创办黄埔军校，随即又以军校生为基础组成了黄埔校军。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支由政党创建并指挥的军队。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郑重地将黄埔军校的部队命名为“党军”。以党建军，以党控军，军队信仰“主义”，后来国民党以“党军”为基础，组建了国民革命军，并靠这支军队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政权。它曾经是一支革命的军队，但后来变成了蒋介石屠杀工农、背叛革命的工具。因而这支军队最终也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这支人民军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第三代近代军队，它承担着救国救民的重任。但是，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到底如何建设，如何才能使它真正承担起救国救民的使命，全党都在探索，毛泽东也是在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找到了答案。

中共中央最初提出的“新的革命军队”设想是：千方百计改造旧军队，想方设法武装工农，废除雇佣制，开始志愿兵制，渐进地建立义务征兵制。同时在新的军队中，建立“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坚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不过，这只是一个设想，如何付诸实施，没有先例可循。更何况，人民军队初创时期，人员组成非常复杂，基本的成员是农民，主体是旧军队的成员，农民武装所特有的乡土观念严重，缺乏远大理想，旧军队的军阀主义、封建主义管理方式等陋习不可避免地被带到人民军队中。由于面对强敌，斗争环境极端恶劣，部队数度溃散。所以，共产党创建了自己的军队，但要真正控制和领导它，发展壮大它，还需要探索和实践。毛泽东的贡献在于，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不依靠个人魅力和威望去影响与控制部队，而是依靠党的力量、依靠制度的权威来制约个人，整肃队伍，控制进而改造发展

这支军队。他非常清楚，红军是党的军队，而不是个人的资产。他所领导的是中国第一支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红军。在这支军队中，统帅威望形成是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密不可分的。个人威望可以稳定并发展一支队伍，但要建设正规强大的新型人民军队，则必须为这支军队植入军魂，赋予这支军队坚定的信仰、坚强的信念和完善的制度。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通过把党的血液输送到队伍的躯干，改造部队的基因组织，构成部队中枢神经网络，进而实现部队的脱胎换骨。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主持了三湾改编，在这次改编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明确规定整个部队行动受党的前敌委员会指挥。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所以，罗荣桓后来在回忆三湾改编时说：“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在井冈山斗争期间，红军中党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党的各级组织日益健全。明确党的支部为连队的核心，实行党代表兼任党的书记制度，规定重大问题必须经各级党委（支部）集体讨论决定；颁布《党代表工作大纲》，确定党代表在党委（支部）领导下，与军事首长共同管理、指挥部队，并负责组织领导部队的党务、政治教育和群众工作；规定党的前委对部队的作战与行动拥有绝对的最后决策权，等等。军队中党员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毛泽东曾经设想使部队中的党员与非党成员比例达到1：1。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比例以1：3左右为好。1928年5月，红4军党员人数达到1600余人，占总人数的1/4以上。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成为部队运转的轴心，特别是稳定和控制部队的中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被赋予实实在在的内容，并通过制度、法规的确立来制约个人，指挥全军，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能够贯彻到部队工作与行动之中。这就保证了任何情况下，人民军队都能够红旗不倒，队伍不散。

但是，一支军队的塑造绝非朝夕之功。1929年，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争论又起。一些同志对重大决策由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非常不习惯，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甚至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同时部队中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也很严重。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前委改选中落选，离开了红4军。红4军中出现思想混乱，在军事上也吃了败仗。这时，许多同志才意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开始转变看法。此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给予毛泽东极大支持。在接到红4军的有关报告和听取了陈毅专程赴上海所作的汇报后，周恩来主持起草和发出了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要求立即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做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4军，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主持召开了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总结红4军建设的经验教训，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这八个决议案统称《古田会议决议》，主要内容：一是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线与政策。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还要担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建立党组织的任务；二是确立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必须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建设，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三是明确了军队中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强调军事工作“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所担负的工作；四是强调加强红军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将之视为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五是规定处理军队内外关系的原则，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制度，尊重地方民主政权，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实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策。这就澄清了红军建



设中一系列错误认识,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从而划清了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军队的界限,塑成了人民军队独有的政治特征,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基石,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被毛泽东视为立军之本,建军之魂,从不放松。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历尽艰辛,终于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统率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依恃兵广枪多,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中央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张很不满足,想当军委主席,要求给军委“独断决行”的权力,还想控制中央领导权。中央和毛泽东为维护党内和军队团结作了一些让步,但在涉及中央领导权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让步。后来在总结张国焘分裂党和军队的教训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人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决不容许其他实力插手人民军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在国共双方讨论红军整编事宜时,国民党方面要派特务头子康泽到八路军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一口回绝,立即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为了抗战,他可以同意部下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但决不容许康泽之类的特务踏入人民军队营门一步。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主张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实行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纪律。毛泽东坚决反对说,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统一战线的武装。他很形象地把这一政策比喻为“白皮红心萝卜”。抗战胜利后,在国共谈判中,国民党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换取政府中近1/3的席位。毛泽东的回答非常坚决:“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为了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落实,毛泽东确立了一整套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三大环节:一是政治领导,就是用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统一全军的思想与行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思想领导,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武装官兵,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组织领导,就是在军队中建立和保持一支坚强有效的组织系统和党员队伍。建立各级党小组、党支部、党委,形成与部队建制体系相适应的组织系统,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的领导与指挥管理权高度统一。这就使得人民军队真正成为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军事工具,彻底革除了旧军队中高级将领拥兵自重的顽疾,保持了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

关于怎样看待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怎样理解“生命线”的内涵,需要首先理解这一概念形成的历史。实际上“生命线”这个提法的发明权不是毛泽东。中央苏区时期,1934年2月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等在讲话中就用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提法。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把军队政治工作的定位定性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在系统总结人民军队建军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赋予了军队政治工作科学的内涵,使之系统化、制度化。

1944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指导和修改定稿,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最后由谭政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科学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军队政治工作给予定位和定性。毛泽东对报告的第二部分修改最多,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向、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制度。其中,明确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定位,并强调“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关于“生命线”的内涵,归纳为三条:一是保证,就是政治工作要以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保证党所赋予军队各项任务的完成;二是配合,就是政治

工作要与军事工作相配合，军事工作离开了政治工作的保证就会迷失方向，政治工作脱离了军事工作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两者紧密结合，就构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才能完成党赋予军队的任务；三是适当，就是强调政治工作在革命军队必须有适当的地位，适当地强调其作用。既反对过分强调，又不允许有任何削弱。同时，报告作出了“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和“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和当前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这样一个重要的论断。正因为报告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作出了根本性的结论，对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向、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制度作出了科学的阐释，所以这个报告曾经被称作“抗战时期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和制度成熟化的标志之一。

总之，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决议，再到谭政报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完善成熟，这是毛泽东留下的重要军事遗产之一，到今天依旧影响规范着人民军队的基本制度。

### 毛泽东的军事遗产：永远的财富

【张世平】“遗产”的最大价值在于有用性与可用性。斗转星移，世事变迁。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国家安全形势、战争形态、空间、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战争的本质没有变，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战略和作战思想的现实指导价值没有变。正如美国人悟出的道理：不怕中国军队信息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思想化。我们没有信息化战争实践，面对强敌，如果丢掉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统优势，“能打仗，打胜仗”就只是一句空话。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军战略和作战指导理论尚未经过实战检验。重温毛泽东的军事遗产，在战略和作战思想方面，他强调的主动性、攻势性、人民性、节制性、灵活性仍属战争通则，在当代依然具有实践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针对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师其意不泥其迹”地运用和回归，将是对毛泽东军事遗产最现实的享用和传承。

【黄迎旭】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他在战争中把辩证法运用得出神入化。毛泽东讲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强调要实事求是；要分析矛盾；要按照矛盾相反相成法则处理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很看重的两篇著作，收入了他的选集，比较系统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战争本身是辩证的，战争指挥也是辩证的。我们应该在品读毛泽东的原著中，掌握他的辩证法，在未来战争中指导实践。如此，才能体现我们对毛泽东军事遗产的珍视和继承。

【曲爱国】实际上，我们永远无法彻悟巨人和统帅，我们每个人对毛泽东军事遗产的领悟，最多只是涉及毛泽东军事遗产的一点一滴。因此，今天只是与大家分享我们对毛泽东军事遗产粗浅领悟和点滴收获。如果能够启发大家更加深入地关注、研究这个命题，就非常兴奋和自豪了。

责任编辑：潘 宏